

彭真在 1959 年中共「反右傾」 運動中的角色和作為*

鍾 延 麟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 要

1959 年夏，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中發起「反右傾」，既引發黨內激烈的政治鬥爭，更讓「大躍進」益加惡性發展，造成經濟嚴重失調和大規模的饑饉死亡。當時經常參與最高決策、也負責將之落實的彭真，在「反右傾」中的關鍵角色和重要影響問題，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西方學者對此不甚了解，中共官方所撰的彭真傳記也刻意避重就輕。這段時期代替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彭真，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其後，皆竭力配合毛澤東，作為「反右傾」的主要執行者。彭真在廬山上積極響應毛對彭德懷等人展開的政治批鬥；返回北京後，他負責督導、推促中央黨政部門、軍隊、首都北京市，以及高校的「反右傾」運動。從上述的政治過程中，可以增進對彭真個人以至中共相關的政治事件和歷史的認識。

關鍵詞：彭真、「反右傾」運動、廬山會議、毛澤東、中共政治

* * *

壹、前 言

1959 年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寫信給中央主席毛澤東，陳述他對 1958 年發動的「大躍進」運動的看法。毛澤東為此大怒，發動「反右傾」鬥爭嚴厲批鬥彭德懷和意見與之相近的高級幹部，繼而將「反右傾」擴大為一場浩浩蕩蕩的政治運動。在為時半年多的「反右傾」運動中，遭到嚴厲批判和被劃作「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和黨員，超過 300 萬人。「反右傾」運動造成的禍害極其嚴重：在政治上，其造成中共黨內高層政治益加向毛澤東一人獨

* 作者要特別感謝中國大陸的當代中國史學者林蘊暉教授、李海文研究員和國立政治大學的關向光教授曾對本文的惠予指導與評論。作者也感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對本文研究的經費補助（計畫編號：NSC 102-2410-H-004-001-MY2）。

裁的方向傾斜並使得黨內鬥爭更為激烈和無序；在經濟上，其打斷了中共先前數月對「大躍進」所作的一些降溫努力，讓之更加肆無忌憚地發展。中國大陸的國民經濟因而瀕臨崩潰的邊緣，更可怕的後果是，大規模的死亡隨之而來。中共官方向來對此有所隱瞞和折扣，但也招認了 1960 年的人口總數，較前一年整整短少了約有 1,000 萬人之眾。^①

毛澤東發動「反右傾」運動的主導角色，已眾所周知。但是毛倚重何人的協助，遂行其「反右傾」的構想和目標？從組織架構和人員安排上，中共中央在 1956 年「八大」成立新的中央書記處，以作為執行中央重大決策的負責機構。由鄧小平和彭真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在 1957 年就積極地貫徹毛發起的整風、「反右派」運動。^②兩年後，當毛決定要發起「反右傾」，此一政治任務還是交給中央書記處負責。此時鄧小平因腿傷請假療養。在毛的指示下，書記處的工作由彭真代理主持。再加上，彭真同時擔任中共首都北京市的黨委第一書記。因此，可以想見無論是在中央或是北京市的「反右傾」運動中，彭真扮演的自非一般的角色。

關於彭真在 1959 年「反右傾」運動中的重要地位和具體作為問題，在現有的中、西相關文獻中，乃是一塊需要補強的重要空白。西方學界雖有注意到彭真在中共政治上的能量和活躍，但因為其對「反右傾」運動本身關注甚少，根本無法知曉彭真在其中所處的顯要位置。^③西方唯一一本彭真的英文傳記，甚至幾無提及彭真與「反右傾」運動的關係。^④在中國大陸方面，有關中共歷史的著作對於「反右傾」運動本來著墨就不多，其中也沒有任何一個針對彭真的介紹和討論。彭真的官方傳記——〈彭真傳〉無法迴避這個問題。但不令人意外地，出於為尊者諱的立場，該傳對此一問題處理的方法是，側重揀選彭真在「反右傾」中顯得比較「與人為善」、「慈眉善目」的個別片段，例如：他提議保護了誰，以及他對處理犯錯幹部問題的提醒。^⑤但其迴避了一個更重要的事實：彭真是毛澤東在中央委託的「反右傾」主要執行者，他對運動全局的推動到個別部門（從中央各部到彭掌管的北京市）運動的升溫，都有所參與和效力。

綜前所述，針對彭真參與「反右傾」運動的問題，迄今尚無一個嚴謹、專門的學術研究。毛澤東在「大躍進」的第二年發起「反右傾」的前後，彭真所持的政治態度

註①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 70 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頁 367~369。

註② Yen-Lin Chung, "The Witch-Hunting Vanguard: The Central Secretariat'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06 (June 2011), pp. 391~411.

註③ 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pp. 144, 163, 169~170; Frederick C. Teiwes,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2nd edi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pp. 329~342;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61, 179, 357.

註④ Pitman B. Potter,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註⑤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 3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1000~1002。

為何？在廬山會議的「反右傾」鬥爭中，彭真有何作為？在「反右傾」繼而推向全黨以後，彭真扮演什麼角色？特別是其擔任領導要職的中央部門和北京市的運動發展，彭真介入的具體情形為何？本文嘗試回答上述的問題。

本文的主要論點為：彭真在中共上層政治中甚為活躍，既是常參與最高決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是負責執行中央決策的中央書記處的第二號人物。1958 年「大躍進」發動後，彭真因為中央書記處的擴權更是位高權重。1959 年夏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做出「反右傾」的決策以後，此時代替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彭真，作為「反右傾」的主要執行者。在廬山上，彭真跟隨毛澤東一起狠批後者所認定的以彭德懷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他在助毛領導、佈置會議時，也審時度勢地提供建議，讓會議盡快地朝毛所希望的方向發展。下廬山以後，彭真也多方面地參與、督導「反右傾」運動。中央黨政部門、軍隊、首都北京市及其高校的運動中，都可見到他積極任事、一旁煽動的身影。彭真在相關的政治過程中，盡力達到毛欲將「反右傾」加溫 and 擴展的期望，也注意總結、推廣運動經驗，以讓其他部門參照和效仿。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試圖重建彭真在 1959 年中共「反右傾」運動中的角色和活動，冀以對彭真個人的政治面貌、他在「文革」前對中央和北京市的政治管理，以及中共相關政治史的研究有所裨益。本文的章節安排，除此前言外，有六個部分：一、簡述彭真的從政歷程、黨內地位，以及其在「大躍進」初期的意向；二、彭真在廬山會議轉入「反右傾」後的活動情況；接下來四個部分則分別介紹彭真對軍隊、中央機關、北京市以及首都高校的「反右傾」運動的參與情形。在結論的部分，首先扼要綜述彭真在「反右傾」中的主要作為、行事動機和對之後續處理的問題，最後簡要探討本文如何能對中共政治史的相關研究，特別是對「大躍進」與中共菁英政治研究有所助益。

貳、彭真在 1959 年中以前的政治地位和意向

一、彭真早期的政治情況

中共蝸居陝北延安時期，彭真在毛澤東的提攜下已在中共高層嶄露頭角。彭真在延安整風中擔任要職，負責審查幹部。他在 1945 年舉行的中共「七大」，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夏，抗日戰爭結束後，彭真進而被選為中共當時最高決策機構中央書記處的候補書記，也被指定為中共東北局的最高負責人，領導多位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執行同國民政府搶佔東北地區的重要任務。

彭真在東北遭遇了一次嚴重的政治挫折。因為彭真在領導東北局期間，與陳雲、高崗、林彪、張聞天等人在對情勢的判斷和對策上出現了嚴重的歧異和紛爭。彭真最

後被調離東北局。^⑥中共建政初期，彭真雖然繼續出席中央高層會議並擔任如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要職，但主要的工作重心放在首都北京市負責人的崗位上。1953-1954 年「高崗、饒漱石事件」發生後，因為高崗（其與彭真在東北交惡、結怨甚深）的垮台，彭真對中央政治有更多的參與機會。1956 年的中共「八大」，將原本的中央書記處改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另外新設立一個中央書記處。彭真被任命為新的書記處的第三號書記，協助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貫徹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決策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彭真經常出席常委會議，直接參與最高決策；在中央書記處內，彭真實質扮演副總書記的角色。彭真的權位在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後又進一步地得到提升。

二、彭真對「大躍進」的支持

1958 年毛澤東發起「大躍進」運動，希冀在短時之內改變中國落後的經濟面貌。毛在發動「大躍進」的過程中，大力批判 1956 年由周恩來和陳雲主導的經濟「反冒進」政策。毛不滿周、陳講求穩健、均衡的經濟主張，也不悅他們利用國務院壟斷經濟決策工作。為了讓「大躍進」能根據自己的心意進行，毛下令原先主在負責黨務工作的中央書記處，開始管控政府和經濟工作。1958 年 2 月 17 日，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毛的此一指示：「中央書記處對國務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來。」^⑦

按照此一新的權力安排和組織調整，中央書記處在「大躍進」蓄勢待發之際權力大為擴增；在書記處內僅在鄧小平之下的彭真，其權位也相形水漲船高。再加上，鄧對彭真的放手使用，讓彭真常有機會主事。例如：1958 年中央書記處召開 42 次會議，彭真就主持了 16 次，而其中多與經濟問題有關。^⑧經濟工作是彭真過去在中央鮮有涉足的領域。彭真因「大躍進」之故獲享大權，他對於運動中節節升高的糧食和鋼鐵生產指標也堅信不已、表露熱情，並且負責協助將它們轉化為現實。1958 年夏舉行的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將「大躍進」推上首波高峰—掀起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彭真在大煉鋼鐵上，扮演監督執行者的重要角色。他以中央書記處領導人的身分頻頻召開全國電話會議，催促國務院相關各部和各個省分不惜一切代價完成中央分配的鋼鐵生產指標。^⑨

1958 年底，毛澤東注意到「大躍進」出現了一些脫離實際的現象，並帶頭進行糾正偏向的工作。彭真協助毛降低 1959 年的鋼鐵指標，也注意到人民公社制度實行後產生的問題。他在北京市委新發行的理論刊物〈前線〉上，亦提醒黨員幹部既不能右傾

註⑥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主持東北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註⑦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年），頁 288。

註⑧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225。

註⑨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檔案館藏，〈9 月 25 日中央電話會議紀錄彭真同志的講話〉，檔號 219-1-27，1958 年 9 月 25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檔案館藏，〈彭真同志在 10 月 9 日中央電話會議上的講話〉，檔號 227-4-1，1958 年 10 月 9 日。

保守，也不能盲目蠻幹。^⑩但需要強調的是，彭真在「大躍進」有所降溫的階段，從無質疑運動的正確性，其目的是讓運動能更健康、有力地向前開進；他也慎防在糾偏的過程中出現對運動的幹勁不振的情形。正因為彭真在「大躍進」問題上對毛的亦步亦趨，讓後者甚為信任。1959 年 6 月初，鄧小平因跌倒導致腿部骨折。毛聞訊後即指示：在鄧小平療傷養病期間，由彭真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⑪

1959 年 7 月初，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此一會議和後來緊接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常被通稱為廬山會議）。毛舉行此會的目的是：一邊總結運動實行以來的經驗，一邊讓高幹忙裏偷閒、休憩充電。故又有「神仙會」之稱。彭真被中央安排留在北京處理黨國的日常工作，而沒有上廬山開會。彭真在首都留守時，公開表示：「鬆勁情緒和右傾保守思想是當前威脅我們更好地完成全年任務的主要危險。」^⑫亦即經過一陣子的運動糾偏後，彭真認為當務之急是如何振起幹勁、再續躍進。

在廬山會議原定的議程即將結束之前（原本規劃 7 月 15 日散會），彭德懷有感會議未能對「大躍進」問題暢所欲言，甚至存在一種不讓講真話的壓抑氣氛，便在 7 月 14 日寫信向毛澤東表達自己的看法。毛在稍作考慮後，將彭德懷的信件批轉給與會的人士，並下令通知原先沒有上山的重要幹部（包括彭真）前來開會。

參、在廬山會議中投入「反右傾」鬥爭

7 月 17 日，彭真抵達廬山，知道了彭德懷致信毛澤東的情況。要如何看待彭德懷的信呢？彭真表現得非常的謹慎，注意聽取各方的意見，但不顯露自己的內心所想。彭真首先詢問他所倚重的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和自己身邊秘書的意見。劉仁和彭的秘書皆只認為彭德懷的信「有些話過了一點兒」。彭真聽後也不表態作聲。其次、彭真注意聆聽各方的態度和議論。他派遣秘書去參加會議的各個小組會和閱讀會議簡報，為此，彭真還另外召集在北京的其他秘書前來廬山幫忙。彭真在保持耳聽目明的同時，繼續秉持「沉默是金」、以靜制動的原則。^⑬彭真的這種政治謹慎，使之順利度過了從毛澤東印發彭德懷的信件到他公開表態以前的這段政治敏感期。

毛澤東在 7 月 23 日的全體大會上作了長篇講話，痛批彭德懷立場「右傾」，也連帶敲打那些支持彭的信件內容的黨人如：身兼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等人。後來毛更誣指相關人士組織一個「反黨集團」。廬山會議自此正式掀起了「反右傾」鬥爭的帷幕。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彭真協助毛在會上推行、開展「反右傾」的議程。

註⑩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 3 卷），頁 985~995。

註⑪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頁 410。

註⑫ 同前註，頁 421。

註⑬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 3 卷），頁 998~999。

一、加入批判彭德懷的行列

7 月 31 日和 8 月 1 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細算了彭德懷的「錯誤」並將之定性。彭真出席這兩次中央常委會議，參與對彭德懷的圍攻。這顯現了彭真在中央一級所享有的「不是常委的常委」和實質位居副總書記的重要地位。彭真在兩次常委會議上發言時，確切執行毛澤東對批判彭德懷所提出「對事也對人」的方針。也就是不單狠批彭德懷在廬山上對「大躍進」提出的質疑和批評，對於彭德懷參加中共革命以來的種種問題，也翻箱倒櫃般通通批一遍，而且還要深究、追查他相關言行背後的政治用心和動機。詳情如下：

（一）彭真以捍衛最高領袖的姿態，指控彭德懷在廬山上居心不良，蓄意將政治矛頭對準毛澤東，存心要向之究責。如前所述，彭真仔細地掌握會議各小組的發言簡報。彭真有心地綜整了彭德懷言論中的「痛腳」，並直接質問後者：「你在西北小組講：人人有責，包括毛主席，個人威信不等於黨的威信。說毛主席的話亂傳一氣，盲目服從。說到處第一書記掛帥，削弱集體領導。1070 萬噸鋼的指標是個人決定。說下毛毛雨，送材料又不看。這些劍靶子射誰？」^⑭針對彭德懷寫給毛的信，彭真表示：「信是個綱領，一條路線，重點在後一部分，目標是毛主席。」^⑮

（二）彭真重翻彭德懷的歷史老帳，藉以說明彭德懷在廬山「犯上」、另立旗幟並非孤立現象，在過去早有先例可循，甚至說是一個「慣犯」，並慶幸黨內是由毛澤東掌舵，而非彭德懷做主號令。彭德懷在廬山會議前期曾提及 1945 年延安整風中華北地方工作座談會的往事，覺得當年受到不合理的對待，甚至氣言當時被「罵娘 40 天」，要在此次廬山會議中回敬。華北地方工作座談會乃是 1945 年毛澤東幕後操控、彭真擔任主要批判砲手的一系列專門針對彭德懷的批鬥會。其前後計有二十餘次、歷時約 40 天之長。華北地方工作座談會批彭德懷火力之猛、上綱上線之高，彭真在 1954 年也承認有所不妥和過火。^⑯彭德懷在廬山挑起 14 年前的此一延安舊事，當年的主事者毛澤東和彭真恐怕都心裏不快，甚至覺得前者的相關言論是衝己而來。^⑰毛澤東在廬山上開始批判彭德懷後，口頭上雖說要在此次滿足彭德懷回罵娘 40 天的願望，但實則是要讓後者重溫華北地方工作座談會的那場政治惡夢。參與、熟悉該座談會的彭真，出面負責此事。

彭真在 8 月 1 日的常委會議中，重彈華北地方工作座談會批判彭德懷的內容：批

註⑭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3 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99。

註⑮ 同前註，頁 207。

註⑯ 1954 年 2 月 8 日，彭真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的發言中，就自身在延安整風中的錯誤作自我批評。當他檢討華北工作時提到：「對當時北方局個別負責同志的批評，也有不妥或過火的地方。」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 1 卷），頁 284。

註⑰ 1965 年 9 月 11 日，彭真代表中共中央約談彭德懷時，還提到此事。他對彭德懷說：「在延安時我們對你有意見，吵了 40 天，拿你的話來說，罵娘 40 天。」王焰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787。

評彭德懷在「過去幾次路線」中的問題，特別是點名後者在抗戰期間「跟中央不對頭」、「鬧獨立性」、「同中央搶先」和在看待王明路線問題上的錯誤。^⑧彭真還將毛澤東和彭德懷加以比較並做出結論：在政治路線上，毛、彭兩人的高下立判。因為毛從過去的歷史實踐到指導、孕育出當前「大躍進」政策的「總路線」，都屬正確。相對地，過去若按彭德懷的主張行事，結果必然失敗，而且才真正是所謂「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的表現。^⑨彭德懷在給毛的信中使用了這個具有刺激性的政治詞彙，彭真用之來反批彭德懷，顯然是要讓後者難堪。

（三）彭真力求跟進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政治人格和未來動向提出批評和質疑。毛澤東早時稱許彭德懷直率、樸素的性格，像三國時代的武將張飛；但在廬山會議上，毛批彭一貫心懷不軌，便改口說其是「內有二心，外似張飛」。彭真聞後也說彭德懷此點「迷惑人」，並明白指出周小舟就是被之蠱惑而站錯了隊。他進而在毛在內的中央常委的面前向彭德懷表示：「同志在一起，應肝膽相照。這麼多元帥支持你，是由於主席，但換不出你一條心。張飛，能換心的。歸根結底，宇宙觀和黨性的根本分歧。」^⑩也就是說彭德懷無法與他人赤誠相待，實是浪得張飛的虛名。另外，毛澤東對於號令三軍、軍功鼎盛的彭德懷，總是存有疑忌。在廬山上，毛直接挑明這個問題，直問彭德懷敢否簽字擔保，不在他身後造反。彭真也對彭德懷提出同樣的疑問和要求。^⑪

二、在旁推進會議的發展

彭真受毛澤東委託在第一線督管廬山會議的「反右傾」議程，努力使會議朝毛所願的政治方向發展和結束。從中也可以看到彭真具有的一些操作空間和政治影響。

（一）為了讓會議「反右傾」的打擊火力聚縮在被毛澤東公開點名批判的彭、黃、張、周等人身上，以逼他們早日就範，彭真提出將中央「秀才」同前述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作區隔處理的政策。所謂「秀才」指的是為毛澤東和中央服務的重要政治秘書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以及〈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吳冷西。「秀才」們在廬山會議初期非議「大躍進」政策，並且對地方的運動實行情形多有批評而和當地領導人發生衝突。在會議開始「反右傾」後，這些「秀才」惶惶不可終日，處境岌岌可危。彭真在與楊尚昆商量後，提出不要對「秀才」鳴鼓而攻之的建議。此一提議為毛澤東所接受。^⑫彭真如此為之，或是揣測到毛澤東對這些長年為之服務的「文膽」，仍有眷顧、懷舊之情，但不好說出口。^⑬從操辦會議的角度出發，此舉也多有益處。

註⑧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 207。

註⑨ 同前註，頁 208。

註⑩ 同前註，頁 206、208。

註⑪ 同前註，頁 197、315。

註⑫ 蘇維民，「楊尚昆談廬山會議」，百年潮（北京），2008 年第 1 期，頁 15。

註⑬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3 年 8 月 4 日。

彭真藉由保「秀才」之策，第一，可以縮小會議的打擊面，將批鬥火線集中在「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人物，以免會議因分散焦點而拖長時間。第二，也可以直接起到分化的作用，讓「右傾機會主義」的「欽犯」益加感到勢單力孤。第三，借用「秀才」作為「筆桿子」的特長，要他們在文字上為「反右傾」辯護和發聲。胡喬木後來在會議後期就受命撰寫一篇強調毛澤東英明領導的文章，以說明「右傾機會主義」對之質疑的其心可議；回到北京後，彭真交代陳伯達從理論的高度撰寫一篇批判彭德懷的文章。^{②4}

（二）彭真見機擇定會議揭發出來的「斯大林晚年」問題，作為會議批判「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重要突破口。毛澤東指控彭、黃、張、周暗組「軍事俱樂部」，試圖要推翻以他為中心的現行領導。但相關指控一直沒有得到很直接、有力的揭發材料來佐證。協助毛督導會議進展的彭真，對此也甚為關注。當黃克誠和水利電力部副部長李銳在會場上被「革命群眾」逼得供出曾私下議論過毛澤東是否可能存有像蘇聯領導人史達林（中國大陸將之翻譯為「斯大林」）晚年獨斷妄行的問題，彭真當機立斷，視之為可坐實毛澤東指控彭德懷等人秘密謀反的關鍵「證據」。彭真下令會議各小組組長就此一新「事證」打鐵趁熱、乘勝追擊。^{②5}果然在會場上不斷強力「逼、供、信」之下，被控涉案者皆難以招架。^{②6}

值得一提的是，李銳在「大躍進」初期被毛澤東延攬為政治秘書，一時頗受毛重用；但在「反右傾」後，他卻沒有被彭真納入在受保護的「秀才」之列，甚至還被彭當作是會議揭發、批判的重點對象。這或與彭真和李銳在延安整風中有不愉快的互動經驗相關。^{②7}

（三）彭真協助毛澤東處理廬山會議「反右傾」的後續政治「程序」問題。「右傾機會主義者」在會中的政治高壓下不得不低首認錯後，還要公開檢討自我錯誤並表態接受對自己的政治批評和指控。彭真負責監審他們所作的檢討內容，以確認其不是試圖瞞混過關。對於張聞天的檢討內容，彭真就很不滿意，當眾批他「很不老實」、「採取隱瞞態度」，「還想把你們的反動根子留著，準備乘機再起」。彭真警告張：「不要企圖再用欺騙的方法，混過關去。混不過去」。^{②8}廬山會議的決議和公報（彭真參與制定，毛澤東也要求彭對之作最後的把關）出爐後，彭真也逼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註 ②4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年），頁 177。

註 ②5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1 年 8 月 21 日。

註 ②6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頁 280~289。

註 ②7 延安整風期間，彭真主持的中央黨校的整風甚為激烈，李銳被捲入其中並遭到錯誤對待。彭真在事後仍認為對李銳問題的處理乃屬正確，並刻意迴避李因工作求見的要求。在廬山會議中，康生重提此事並將之與高崗問題串在一起。8 月 6 日，彭德懷在小組會上作檢查，當他交代與高崗的關係時表示：「高崗到朝鮮去了兩次，談到彭真，對延安審幹有意見。」康生插話：「彭真同志在延安審幹是正確的，高崗想利用這個口號打擊彭真同志，利用一些對延安審幹不滿的人，團結起來反對彭真同志，李銳就是一個。」同前註，頁 252。

註 ②8 同前註，頁 311。

如黃克誠簽字承認。^②

在廬山會議之前和期間，曾對「大躍進」出現的經濟紊亂、浪費和失調現象有所批評、但是「錯誤」還不到「右傾機會主義」程度的人士如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央「秀才」們。他們的檢討問題在下山後也繼續由彭真督管。李先念寫完檢討後，交付彭真審閱和處理。^③中央「秀才」們則兩次被彭真找去談話，與揭發材料進行核對，甚至到彭真住處寫檢討。^④國務院內負責工業、交通工作的副總理薄一波，是大煉鋼鐵的倡議人。他在上廬山前曾跟彭德懷共吐對運動的苦水。在廬山上，薄一波見風向不對即轉而批判彭德懷以求脫身。下山後，薄一波先前對運動帶有批評的講話仍被整理上報。彭真「受中央領導同志委派」，出面指令薄作檢查。^⑤

三、貽誤限制「反右傾」範圍的機會？

毛澤東在廬山上決心大加批判彭德懷後，劉少奇雖和包括彭真在內的其他中共要人一樣對彭德懷痛批嚴斥，但他還是冷靜地想到廬山上這股猛然的「反右傾」，恐會對從去年底開始逐步進行的運動糾偏工作產生不利的影響。劉少奇故而認為批判彭德懷應只在較小範圍的上層內進行，另外下發一紙繼續在下層反「左」的文件。然而，當劉少奇囑咐胡喬木起草相關文件時，胡卻跟劉表示，劉應先要同毛澤東談過方能有所動作，從而引劉不快，劉堅持胡先寫出文稿，他再跟毛溝通。胡喬木擔心此時正處於盛怒的毛，聽聞劉的上層「反右傾」、下層繼續「糾左」的提議，不但不會接受，甚至會認為劉政治意志不堅定，恐怕「也要牽〔連〕進去」。^⑥

熟悉黨內高層人際關係和政治權力傾斜方向的胡喬木，認為彭真是一個可以勸阻劉少奇的人。胡最主要的考量可能是：彭真與劉少奇過去有長期的工作關係，兩者之間可能比較能夠深談；更為重要的是，彭真在中共高層中的政治影響力在「大躍進」開始後，僅在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之後。^⑦此時，鄧小平在北京臥床療腿，在毛、劉之後能說得上話的就屬彭真了。彭真聽了胡喬木的來意後，答應出面與劉少奇相談。維護層峰團結、避免將帥失和，應也是彭真接受胡喬木的請託的主要考慮。劉、彭談話後，劉決定放棄原先的想法。

對於彭真在廬山上勸退劉少奇一事，彭真的官方傳記雖也提及（僅說不知彭真是如何成功勸說劉少奇的，並強調「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和彭真的一貫作風，他也不可能把與劉少奇談話的內容告訴其他人」），^⑧但卻不問彭真相關行動的政治後果。

註②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315~316。

註③ 李先念傳編寫組、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李先念年譜（第3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頁179。

註④ 蘇維民，「楊尚昆談廬山會議」，頁15；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頁177。

註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898~899。

註⑥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77~378。

註⑦ 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07年1月15日。

註⑧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3卷），頁1001。

中共官方編定的〈中國共產黨的 70 年〉不無遺憾地表示：

在 7 月 23 日毛澤東發表講話後，劉少奇曾主張把反右傾的決議只發到省一級，另搞一個繼續糾正「左」傾錯誤的決議發到縣以下單位。這個主張在當時的條件下，沒有能在黨中央提出來。反右傾決議逐步傳達到全黨，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一場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一大批幹部、黨員遭到錯誤的批判，不少人被認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不應有的組織處分。^{③⑥}

易言之，這本中共官史示意：劉少奇欲將「反右傾」侷限在上層而在下層繼續糾「左」的意見，「沒有能在黨中央提出來」，從而錯失了限制「反右傾」橫行、蔓延的機會。中共官方史家的相關論點若能成立，那麼成功勸阻劉少奇的彭真，是否是好事而誤事、多事而害事？

肆、與聞軍隊的「反右傾」

廬山會議後，8 月 18 日至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舉行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繼續批判彭德懷、黃克誠。沒有擔任任何軍職的彭真，以代理主持中央書記處的身分，參與了此次軍隊系統「反右傾」大會的籌備和領導工作。

首先、彭真負責撰寫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召開此次軍委會會議的通知稿。其強調會議的目的是：「爲了傳達討論和貫徹執行黨的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和其他決議」。^{③⑦}

第二、8 月 12 日，彭真偕同毛澤東召集負責軍隊人事和思想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軍事書記、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和副主任蕭華，就預定召開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作先期討論。^{③⑧}軍委會會議開始進行以後，8 月 27 日，彭真出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一同聽取該會情況的彙報，^{③⑨}以確定其會按照規劃的「反右傾」方向發展，以成功肅清彭德懷、黃克誠在軍中多年累積的聲望和影響。

第三、彭真出席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和外事會議的聯席會議，以中央要人之姿在會上講話。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進行的同時，外事系統也在舉行一場旨在批判張聞天的會議。對於軍隊和外事系統各自召開的「反右傾」會議，中央爲了表示對之的重視，特別將兩會的與會人員集中在一起，由中央領導人出面演說，以進一步統一認識。現身會場並公開發言的中央領導人除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彭真也在列。彭真的官方傳記和年譜，對其傳主出席此一聯席會議沒有記錄，更無記載其講話的內容。不

註③⑥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 70 年〉，頁 366。

註③⑦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頁 429。

註③⑧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頁 429。

註③⑨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新編本）（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頁 1746。

過，在場聆聽的張聞天的秘書清楚地記得彭真在會上公然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我覺得他〔彭真〕還講得比較輕鬆。內容記不住了，但有一點記得很牢，就是他說的：我給同志們介紹一個「偷懶」的辦法，不要想的太多，毛主席一切都給我們想好了，你照著辦就行了，何必去想入非非，離開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自然不是他的原話，但這個意思我一直記著。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批他不讀書不看報，我就想起了他的這次講話，後來也經常聯想到。^⑩

第四、彭真在軍委擴大會議期間參與對朱德的約談工作。

朱德雖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在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時，他出於對戰友的憐惜之情，只就彭德懷的信件內容發言，不忍對之苛責。毛澤東當場抬腳、摳摸鞋面，以示朱德是「隔靴搔癢」，讓他滿臉通紅，無法繼續講下去。下了廬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續整彭、黃，朱德也被要求在會上公然作檢討。9 月 10 日上午，爲了「協助」朱德做好預定在大會上的檢討，彭真和周恩來、陳毅、賀龍約朱德談話。當晚，毛澤東召集上午談話的原班人馬（彭真在內），並另加劉少奇、羅瑞卿開會。經過前述密集的政治工作後，朱德在 11 日的大會上低首檢討，並遭林彪當面斥責是「老野心家」、「想當領袖」、「實際上沒當過一天總司令」。^⑪

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結束後，彭真一方面代表黨中央繼續掌握軍隊內部的「反右傾」運動執行情形。例如：11 月 9 日，彭真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總政治部的運動彙報。^⑫另一方面，受毛澤東之託，彭真和楊尚昆負責彭德懷的安置問題。他們最後將彭德懷安排至中央高級黨校，要其虛心省過、勸之潛心學習。

伍、監管中央部門的「反右傾」運動

彭真從廬山下來、返抵北京後的次日（8 月 20 日），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要盡速對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副處長以上幹部和國家機關黨組成員，傳達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的會議情況和精神，以讓他們早識「廬山（會議）真面目」。在楊尚昆的緊急張羅下，21 日下午，相關傳達會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彭真、周恩來親自到會傳達。^⑬8 月 28 日上午，彭真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指定候補書記劉瀾濤、楊尚昆以及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注意」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國家機

註⑩ 時任張聞天秘書的何方向作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1 年 8 月 21 日。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上冊）（香港：明報出版社，2008 年），頁 317~318。

註⑪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新編本）（下冊），頁 1747。

註⑫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頁 455；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頁 442。

註⑬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頁 431~432；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 421。

關兩個黨委學習廬山會議決議的問題。平時就負責指導兩個機關黨委工作的楊尚昆，在同日下午即進行佈置。^④事實上，彭真後來就主要依靠楊尚昆在中央黨政機關內推行「反右傾」運動。然而，因為當時中共中央和彭真個人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籌備即將到來的 1959 年「十一」國慶，也就是「十年大慶」。所以相關部門機關的運動在 10 月以後，才逐漸開展起來。

10 月 20 日上午，中央書記處召集中央黨政部門（包括工人、青年、婦女工作的全國領導機關）的正副部長和北京市的黨政領導幹部在中南海懷仁堂開會。彭真在會上作「反右傾」的專題報告，希望藉此動員黨政高幹，推進中央部門的運動。關於「右傾機會主義進攻」的問題性質，彭真言其是「十年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繼續」，「到廬山會議是個總爆發」。^⑤他進而指出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對於捍衛「三面紅旗」的關鍵意義：「自中央提出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以來，一部分富裕中農和資產階級感到資本主義的根子被挖掉了，就要試一下和共產黨較量。如不嚴肅批判，總路線貫徹不了，大躍進不能實現，人民公社不能鞏固。」如何批鬥和處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真強調「批判要提到原則高度」。^⑥

就實際的運動操作而言，彭真講的「批判要提到原則高度」，指的並非是批判要按照事情的是非曲直的原則進行；相反地，其意指批鬥一旦鎖定了特定的目標和對象，所有對其的質問、揭發都要緊扣著有關的政治指控，或是力將兩者上牽下連（亦即沒原則的上綱上線），使被批判者在眾口鑠金、三人成虎下難以全身而退。聽聞彭真的運動號令後，楊尚昆同日即「約國家機關黨委和中直黨委彙報」，以一一掌握各部門的運動進度。^⑦

讓彭真、楊尚昆不敢懈怠的是，毛澤東對於中央黨政部門「反右傾」運動的緊密關注。由楊尚昆擔任主任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其編印的〈情況簡報〉中會登載中央部會運動的情況。毛澤東從中讀閱關於國家機關各部門的鬥爭報導後，10 月 22 日直接批示彭真和楊尚昆，問及黨屬中央各部的運動情形，更要求：「請你們抓緊辦一下，使這個鬥爭深入下去。」^⑧毛的這個運動指示為中央黨政部門的「反右傾」起到加溫的作用；它也明白標示彭真和楊尚昆是具體的統籌、執行者。

彭真和楊尚昆想到的「抓緊辦一下，使這個鬥爭深入下去」的一項重要辦法，就是分別在中直機關和國家機關中各找一個運動的「典型」，細心觀察和指導，再以之為範例推廣，要其他單位效尤、跟上。他們在中直機關裏選的是中央工業工作部，在國家機關裏則選取輕工業部。這兩個部門的副部長高揚和宋乃德，因為對「大躍進」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多有批評，「反右傾」開始後即成為部門內運動的首要標靶。楊尚

註④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頁 433；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 423。

註⑤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 3 卷），頁 1001。

註⑥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頁 450~451。

註⑦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 438。

註⑧ 毛澤東，「關於中直機關開展反右傾鬥爭問題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8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557。

昆對輕工業部的鬥爭，甚為重視。在 10 月下旬至 11 月上旬，楊不但專門和國家機關黨委相談過，後來又約請後者彙報「反右傾鬥爭情況」，他更安排國家機關黨委和中直黨委召開聯席會議，聆聽輕工業部「反右的經驗交流」。爲了將中央工業部的鬥爭增溫，楊尚昆也特地召集安子文和中央工業部兩位副部長李立三和于江震談話。^④

眼見中央黨政部門的「反右傾」漸入「佳境」，11 月 9 日、10 日，彭真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中央直屬機關和中央國家機關兩個黨委彙報運動進展情況。彭真在會上表示：

這次運動主要解決黨內問題，黨外不進行。黨內主要對象是「當家作主」的領導幹部，內容以兩條道路鬥爭，社會主義教育為綱；對總路線、人民公社的態度是分水嶺和試金石。這個問題解決了，天下大定，其他問題放在次要地位。^⑤

以當時中央黨政機關內如火如荼的運動發展來看，主要的批判對象確實皆是彭真所言的「『當家作主』的領導幹部」，如前述的中央工業部副部長高揚和輕工業部副部長宋乃德，還有國家計委副主任賈拓夫，以及水電部副部長李銳等。更重要的是，彭真說有關問題的解決，攸關「天下大定」，所以其他議題都得爲之讓路。此話不但可以看作是他對批鬥如上犯有「右傾錯誤」人士的認可，還有強調其迫切性並催促行之的意思。

彭真在講話中雖也提到：在當前運動鬥爭對象中，爲數大量的的是性質較輕的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對之的鬥爭方式要和風細雨、誠懇熱情、擺事實講道理。^⑥但是從彭真接續的話來看，這僅是他在將運動推向另一波高峰前，爲自己預留政治台階，以示其事先已予以提醒而對有關政治後果概不負責。因爲彭真話鋒一轉，指出運動「要抓住兩頭。既不要過火，又不能不發動群眾。」「北京市和中直機關中，也有對無產階級思想格格不入的幹部。毛主席嗅覺靈敏，一回到北京就感到不舒服。所以北京市要把運動搞透，『把司令部、參謀部搞好』。」^⑦

事實上，中共的政治運動一旦啓動，發動群眾忘私、忘我地投入是題中必有之義，不如此，參加運動的各方的政治面目無法呈現、分流，黨就無法從中進行分類、排隊和拉打。因此，運動過火根本在所難免。更何況，彭真都說毛澤東已聞嗅到「右傾」異類藏諸於中央高參部門，不竭力除之，怎能向之交代？彭真說要把運動「搞透」、「搞好」，無異是要中央黨政部門繼續深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到底。然而，做到多少才是透頂？彭真卻沒有說出明確的底線。在「寧左勿右」的政治氛圍下，下級幹部自然是想多抓挖一些「右傾」嫌疑犯會比較保險。國家機關黨委（書記是龔子

註④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 439、441~442。

註⑤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頁 455。

註⑥ 同前註，頁 455~456。

註⑦ 同前註，頁 456。

榮)對於回報沒有鬥爭對象的單位,就批作是「清水衙門」;對於運動進展稍緩的單位,就批之為「落後單位」;針對想要提早結束運動的單位,就稱之抱持的是「差不多思想」。^⑤在窺測上意和層層加壓之下,運動溫度更是筆直爬升。

按照彭真所提的把「司令部、參謀部搞好」的指令,11月中旬,楊尚昆先赴中直機關黨委開會,「佈置目前反右傾鬥爭」,然後召集安子文和中央工業部內部負責主持批判高揚的李立三談話。對於國家機關的運動,楊尚昆除單獨過問總工會的「反右傾問題」,也聽取國家機關黨委彙報整體的運動進度。彭真恪遵毛澤東「抓緊辦一下」的運動的指示,11月21日下午,他和楊尚昆再次聽取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和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彙報「反右傾」運動情況,歷時三個鐘頭。^⑥

自10月下旬起,在彭真幾次緊盯、楊尚昆親自動手下,中央黨政機關的「反右傾」運動在短短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出現了益加激越的發展,引起毛澤東的興趣。中央辦公廳整理、刊登的運動報告,說明國家機關的運動「群眾發動得愈加廣泛、深入」,「重點批判對象增加,批判也更加深入、細緻」,以及「領導核心健全有力或者已經得到改進的單位」佔八至九成。毛澤東閱後覺得值得一看,還向妻子江青和秘書推薦。^⑦

領毛之命監管中央黨政單位運動的彭真,出於職責要求,也念於運動發展有成而有心呈獻上級,故常會報送相關運動進度簡報給毛。毛對彭真送上的中直機關「反右傾鬥爭」中重點對象的統計饒有興致,還要後者隨時選送一些運動相關的重要材料性文件讓之讀閱。^⑧這也反映了中央部門的運動發展過程,毛統交彭真、楊尚昆經管,他自己重在驗收運動結果。毛流露出的欣賞和放心,又進一步地鼓勵彭、楊對已屬明顯過熱的運動勢頭不願收手,進而在11月底至12月中之間,頻率更高地聽取中央各機關的運動彙報,包括:中央工業部、外交部、水電部、全國婦聯、中央高級黨校…等。^⑨彭真還會揀選中央黨政部門有效的運動經驗和鬥爭心得,請示毛澤東擬以中央名義批轉給各地、各級參考和仿效。^⑩

彭真和楊尚昆在1959年最後一季經營的中央黨政部門運動中,挨批對象的具體人數問題,可見諸1960年1月15日獲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關於在反右傾鬥爭的整風運動中犯有錯誤同志的處理問題的請示報告和關於

註⑤ 中央國家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關於反右傾整風運動的初步檢查和積極進行甄別工作的意見(1962年4月10日)」,宋永毅主編,《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10年),頁2。

註⑥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43~445。

註⑦ 毛澤東,「對中央國家機關反右傾鬥爭情況等三個材料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頁594。

註⑧ 毛澤東,「關於隨時選送有重要材料性文件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頁587。

註⑨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47~449、452。

註⑩ 例如:12月16日,彭真致信請示毛澤東,提出擬以中央名義批轉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整理的〈老幹部為什麼過不了社會主義這一關〉。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3卷),頁460。

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原則》。該文件披露：此二黨委所屬黨員中，在運動中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者共有 1,900 人，佔黨員總數 61,559 人的 3%；被列為重點「幫助」對象者共計 2,714 人，為比例的 4.4%。重點批判對象中職等在司局長以上（黨中央直屬機關是 12 級以上）的黨員幹部就有 287 人，佔同級黨員幹部的 9.3%。^⑤這些數字的一部分在最後轉化、表現為數個「反黨集團」如：在中央工業部抓出了以高揚為首的「反黨集團」；輕工業部則挖出了以宋乃德為首領的「反黨宗派集團」。在國家計委有賈拓夫帶頭的「反黨集團」；外交部的運動成果是「張聞天反黨宗派集團」。水電部交出來的成績是由李銳領銜的「反黨集團」。

彭真監管下的中央黨政部門的「反右傾」運動，對於全國範圍的運動的重要影響，除了強硬展示中共中央對「反右傾」絕不馬虎的決心，基於這些中央部會的運動經驗所制定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六條劃線標準和四項處理原則，黨中央也向全黨、全國批轉，使之實質成為中央統一下發的範本。^⑥然而，相關的劃線標準的內容甚為抽象、空泛，讓各地、各級的黨幹有很大的自我權衡和裁量空間，助長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濫戴、亂扣的情況。

陸、領導北京市的「反右傾」運動

一、在燕京貫徹「反右傾」

8 月 25 日至 9 月 5 日，在彭真的指示和領導下，北京市委召開全體委員擴大會議。出席者除 43 名市委委員和 12 名候補委員，還有市級黨政機關、各區縣委、各主要產業系統、高校、醫院及文藝團體的負責人，計 450 人列席會議。可說是首都的高、中級幹部齊聚一堂。會議的進行過程是：彭真的副手市委第二書記劉仁首先傳達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精神。會上播放毛澤東、劉少奇在廬山會議期間的講話錄音後，與會人員一起學習廬山會議的各項公報和決議。會議在文件學習的基礎上，一方面，檢查市委的領導，並得出「一致認為市委執行黨的總路線是堅決的，在這次大風浪中是站住腳的，對右側歪風是頂住的」的結論；另一方面，集體討論如何結合北京市的情況貫徹和落實「反右傾」。在會議進行期間，為了擴大此會的影響並動員下級黨幹，8 月 29 日至 9 月 2 日，由劉仁和蔣南翔向全市縣、團級以上的黨員幹部 14,000 多人進行傳達。^⑦

作為北京市委最高領導人的彭真，在會議尾聲作總結報告。他在講話中提出：「必須利用這次機會在全黨普遍進行一次消毒，在全體黨員幹部中普遍檢查、揭發、批判

註⑤ 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 40 年，增訂本（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頁 176。

註⑥ 同前註。

註⑦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北京市重要會議概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頁 63~64。

右傾思想、右傾情緒、右傾活動，徹底肅清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提高思想覺悟。」^⑫彭真的此番言語，預示了他主管的北京市將經歷一場「反右傾」的政治風暴。

市委擴大會議結束後兩天，9 月 7 日，爲了證明毛澤東發起「反右傾」運動的及時和必要性，以及其產生的強大政治威力，彭真爲首的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提交一份書面報告。其中批評所謂的「右傾保守思想」導致北京市 5 月至 7 月的工業生產的下降。反觀開始「反右傾」後的 8 月，首都的工業即恢復「大躍進」的態勢：該月份的工業總產值超過計劃的 15.2%，較諸受「右傾保守思想」籠罩的 7 月份增加了 19%。鋼和鋼材的產量也都創造了是年的最高紀錄。雖然經濟情勢已恢復，但是對於先前颺「右傾歪風」者，彭真領銜的市委強調絕不輕縱，並說在市委擴大會議之後，要「進一步在黨員幹部中揭發和批判右傾思想」。^⑬對此，彭真沒有食言。幾乎與彭真監管的中央黨政機關的「反右傾」運動發展同步，彭真領導的北京市的「反右傾」運動，在 10 月至 11 月步入了高潮。

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在 12 月 2 日上呈給中共中央的「反右傾」運動報告中指出：運動首先在全市 17 級以上的黨員幹部 1.6 萬餘人中進行。截至 11 月底爲止，已發現重點批判對象 949 人，佔參加運動總人數的 6%。其中包括：市府的正副局長 11 人（佔同類幹部 135 人的 8.1%）、高校正副領導人 23 員（佔同類幹部 167 人的 13.8%）、大型企業的正副書記和廠長 20 人（佔同類幹部 262 人的 7.6%），區縣黨委的正副書記 5 人（佔同類幹部 83 人的 6%）。^⑭由此可見首都中間階層幹部遭到慘重打擊的程度。

另外，12 月 2 日的北京市的運動報告中提到：北京市所屬單位中，運動進行得比較好的單位，約有六成，尚待努力或成效低落者還有四成。^⑮爲了讓運動推行成效不彰的單位能盡快動起來，彭真在同月 25 日的市委會議上雖表示「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要盡可能少戴，要防止擴大化」，但仍強調：「整風要進行到底，特別是中央和市委管的兩千多幹部，要搞清楚，輕裝前進。」^⑯看來北京市的黨幹能掌握到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講話的重點和真意。北京市的「反右傾」運動在之後愈來愈熱。最後計有 8,203 名黨員幹部受到批判處分，其中被當作重點批判對象的人數達到 2,771 人。前面彭真所說的北京市所屬的「中央和市委管的兩千多幹部」中，最後受到批判處分者則有 223 名，^⑰亦即約近十分之一的比例，打擊面不可謂不大。

註 ⑫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社會主義時期中共北京黨史紀事*（第 4 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80-81。

註 ⑬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頁 435。

註 ⑭ 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開展反右傾整風運動向中央的報告」，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9 年）（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4 年），頁 868-869。

註 ⑮ 同前註，頁 869。

註 ⑯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頁 460-461。

註 ⑰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社會主義時期中共北京黨史紀事*（第 5 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80。

值得注意的是，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的高層，沒有像其他省份那樣在運動中找出身份高階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文革」的批判資料指出，彭真在 1959 年底的一次市委會議上曾表示：中共中央委員會中抓出了八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領導的北京市委領導班子內一個都沒有。^⑧事實上，彭真這種頗為自豪的北京市委政治正確的形象——他自己為首的北京市委領導有方，在面對「右傾」亂流時不曾動搖遲疑，自始至終都信念堅定。其中部分是以冷血犧牲忠誠的下級黨幹所換來。被彭真和北京市委拿來「血祭」的幹部名叫鄒魯風。

二、鑄成鄒魯風冤案

彭真、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上呈的「反右傾」運動報告裏，位居首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是北京大學副校長兼黨委第一副書記的鄒魯風。彭真為首的市委對鄒氏的「犯行」描述如下：

他在負責指導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共同組成的河北藁城、河南魯山、信陽人民公社調查組時，打著「科學研究」、「實事求是」、「堅持真理」的幌子，背著兩校黨委，私自竄改調查工作方針，不去闡明人民公社的優越性，而是專找岔子，佈置調查組專門蒐集工作中個別的、暫時的、已經克服了和正在克服著的缺點和問題，加以誇大和渲染，攻擊說：「人民公社超越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中央對形勢的估計過分樂觀」，「黨的政策違反了經濟規律」，「1958 年的缺點很大，傷了元氣，教訓慘痛」。他野心勃勃，自以為既有馬列主義理論，又掌握了人民公社大量的實際材料，妄想總結 1958 年的「教訓」，糾正中央的「偏向」，作出有「歷史意義的貢獻」。^⑨

率領人大、北大兩校聯合調查組的鄒魯風，真的如此膽大妄為地違背兩校黨委指示，專挑河南、河北農村人民公社的弊病而不闡明其優越性？彭真和其領導的市委又為何要將之打成首都的天字第一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實際的情況是，鄒魯風案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冤案，他並無違背組織紀律而自行其是、自以為是。其之「入罪」實是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為了證明自身政治正確，夥同兩校領導人共謀而成的。

鄒魯風原任人民大學副校長，是一位對黨緊跟的忠心幹部。他向來積極響應黨的

註 ⑧ 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1925-1966）（北京：無出版者，1967 年），頁 47。

註 ⑨ 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開展反右傾整風運動向中央的報告」，頁 869-870。對於北京市的工作，彭真採取的「抓大放小」的原則。彭真會親自予以掌握的北京市的要事，其中即包括了北京市委上呈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亦即北京市委的重要文件在呈報黨中央以前，必會經過彭真事先的過目和審定。此乃中國大陸一名中共黨史研究者提供的資訊。北京，2013 年 7 月 28 日。因此，北京市委送給中共中央的「反右傾」運動報告中，對鄒魯風的批判排序和指責內容，乃係彭真所認可、同意，在一定的程度上，故也可看做是他的意見。

號召：黨要在校園內進行整風，他唯恐落於人後；⑩黨要加強校園的思想控制，他親力親為。⑪鄒魯風的積極性和向上心也為上級注意並刻意栽培。他在 1959 年春調任為北京大學副校長。鄒魯風到校不久，即擔負重任－領導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聯合組成的河南、河北人民公社調查組。

這個有上百人之眾的兩校調查組，其組團下鄉考察的緣起是：兩校的領導人包括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和人大黨委書記胡錫奎，咸認為「大躍進」有些過於激進，應適當予以調整，希望藉由調查組了解地方實際狀況，並將考察所得呈供上級參考。這些高校黨幹選擇河南魯山、信陽和河北藁城三地作為調查點，應與相關地區的公社辦得早、名聲大，具有一定代表性有關。但是當鄒魯風和調查組深入農村基層後，卻發現人民公社根本不像是當地官方宣傳的那樣先進、優越和有活力。他們決心要將其所見所聞詳實記錄。鄒魯風和調查組的所作所為，北京市委並非毫不知情。事實上，鄒魯風在調查期間跟市委高層保持密切聯繫，並獲得後者的同意和支持。鄒也將相關情況告知調查組成員，以讓他們放心繼續調查人民公社的問題。⑫

鄒魯風領導的調查組結束考察後，將調查結果整理成冊、將觀察心得書寫成文，報送北京市委，相關資料更直接送達彭真個人。⑬鄒魯風當時可能心想自己實事求是、據實以報，是做了一件黨員應該做的事。不久，鄒魯風被市委任命出掌新成立的北京市經濟學會理事會會長。⑭也可見市委對之工作的滿意。沒想到，廬山會議風向一轉，情勢丕變，鄒魯風突然遭遇了他參與中共革命以來最大的政治劫難。根據鄒魯風在人大任職時的同事、後來擔任中共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李新的說法，鄒魯風根本是被彭真的北京市委所出賣和構陷。李新說：

北京市委（特別是彭真）非常重視考察團的報告，準備拿到即將召開的廬山會議上表功。因為那時在廬山會議上，毛主席一定要糾正「左」的錯誤，誰知廬山會議後期的八屆八中全會，忽然由糾「左」一變而為反「右」，反對彭德懷、張聞天的「右傾反黨集團」，於是全黨全國都展開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北京市委為了表現他們反右傾特別積極，便把人民公社考察

註⑩ 「中國人民大學一百三十多位教師座談，揭露矛盾批評學校工作中的缺點」，人民日報（北京），1957 年 5 月 20 日，第 2 版；「徹底消除教條主義、堅決反對修正主義，人民大學開始教學大改革」，人民日報（北京），1958 年 5 月 18 日，第 2 版。

註⑪ 「全國高等學校加強政治教育工作，許多校院長和黨委書記主講政治課」，人民日報（北京），1957 年 12 月 19 日，第 7 版。

註⑫ 汪子嵩，「1959 年『反右傾』運動中的一件個案－憶人大、北大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縱橫（北京），2005 年第 11 期，頁 16。

註⑬ 根據「文革」中的揭發，調查組的相關資料經過北京市委宣傳部門負責人楊述的審核簽署後，遞交市委辦公廳轉給了彭真。「斬斷劉、鄧、彭、陸伸進人大的黑手」，人大三紅（北京），1967 年 5 月 6 日，第 2 版。

註⑭ 「北京市經濟學會成立」，人民日報（北京），1959 年 7 月 20 日，第 6 版。

圖的那批材料作為罪證，把鄒魯風和考察團中的骨幹都打成「右傾反黨分子」。^⑥

彭真和北京市委是怎樣將鄒魯風拋向「反右傾」的赤焰熱火中呢？首先、北京市委所屬的刊物〈內部情況簡報〉突然將鄒魯風所領導的調查組整理而成的資料刊載出來，並冠上「人大、北大部分師生惡毒攻擊三面紅旗」的標題。^⑦其次，在所述的彭真動員全市投入「反右傾」的市委擴大會議舉行期間，9 月 2 日，劉仁在向下傳達該會精神時，點名鄒魯風領導的調查組，批判其調查報告是反對人民公社的。^⑧緊接著北京市委和北大、人大兩校的負責人陸平和胡錫奎合謀共商出一套假說詞：兩校組成調查組前去豫、冀從事人民公社調查前，雙方黨委曾做出一決定，亦即調查的方針是闡明、凸顯公社制度的優越性，而非講其缺陷和不是。鄒魯風在率隊蹲點調查時，不但不按之行事，更背道而行，把公社講得一無是處。^⑨

面對上述突如其來的發展，鄒魯風吃驚不已。他一向對黨忠心不貳，在領導兩校調查組活動期間，也注意和市委高層保持通氣，自認黨是了解他、也欣賞他的。想不到彭真、劉仁居然事後完全不認帳，還倒打一耙。先前跟鄒魯風一道熱心議論「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政策的兩校黨委負責人，為了自保，也感念彭、劉將他們同鄒切割而想要主動爭取表現，便一改過去和氣的態度，擺出了一副義正詞嚴的冷峻面孔，開始向鄒魯風問罪起來。鄒在悲憤、失望下，服食安眠藥自殺。

鄒魯風雖死，對他的缺席批判照樣進行。鄒領導下的調查組成員則在「反右傾」的大小鬥爭會中，面臨了極為嚴厲的批鬥，甚至還被強制要求重返當初的調查地點戴罪立功。扭曲而悲慘的是，他們回去後，特別是在河南信陽目睹了大量的饑饉死亡，但鑒於此前鄒魯風的下場和「反右傾」的震撼教育，卻只能罔顧事實，繼續向北京大唱人民公社的讚歌。^⑩一位被當作鄒魯風的「爪牙」、歷經相關批判的倖存者，後來才領悟其遭遇此番苦難的原因：彭真和北京市委為了表示自身一貫擁護「三面紅旗」，便急忙地從下級中抓（拋）出反對「三面紅旗」的「典型」，以達到「捨車馬，保將帥」的目的。鄒魯風和兩校調查組就被拿來「祭旗」了。^⑪

註⑥ 李新，*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433。

註⑦ 劉武生，「一樁不堪回首的往事——參加人大、北大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的回憶」，*縱橫*（北京），2006 年第 3 期，頁 60。

註⑧ 李震中，「鄒魯風調查人民公社之禍」，*炎黃春秋*（北京），2009 年第 7 期，頁 14。

註⑨ 同前註，頁 15。

註⑩ 同前註，頁 12。

註⑪ 汪子嵩，「1959 年『反右傾』運動中的一件個案——憶人大、北大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頁 17。

柒、督促首都高校的「反右傾」

彭真和北京市委除了深度涉入、甚而幕後主導了鄒魯風案，其對於北京高校的「反右傾」運動發展，也特別關注、別有期待。這或因北京市內高校群聚，是全國高等教育的中心，彭真希望繼北京市在 1957 年「反右派」運動中成功樹立一個高校黨內「反右」的樣板後（清華大學打出一個以其原黨委書記袁永熙為首的「反黨集團」），^⑧首都都能在「反右傾」運動中的高校戰場上再創新功。

廬山會議結束、其政治精神下傳後，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領導人召集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四所高校的黨委書記開會。會中，這些高校黨幹被質問為何不採取行動。他們甚至被問到在各自主管的校園內有無「右傾機會主義者」存在，如果自認沒有，就得當場立下保證書，市委再派人到校檢查。不然就立即回校開展「反右傾」。^⑨陸平晚年對此的回憶是：「一天，市委的幾位領導同志找了北大和三四個學校的黨委書記到市委彙報反右傾鬥爭情況，督促這幾個學校把反右傾鬥爭迅速開展起來，否則，由黨委書記負責。」^⑩彭真領銜的市委的強勢作風和急切指示，讓首都高校黨幹莫不急忙投入「反右傾」戰局。揭發、批鬥「黨員專家」，就是首都高校運動的最重要的「發明創造」。

陸平在北大抓挖「黨員專家」不遺餘力，就算有人為受批者說項，也不領情。^⑪就陸平看來，在該校內具有中共黨籍的教學和研究人員中，對「大躍進」有所批評和非議、對政治運動過多和過頻有意見，以及對「紅」與「專」的比例和要求有不同於黨的看法者，皆須加以批判、處分。^⑫彭真的北京市委在向中共中央報告時，則將文教部門內的三類人視作「黨員專家」：

一種是新入黨的老專家，自認是帶著「業務」入股的；一種是轉業的老幹部，在掌握了業務知識以後，思想蛻化了；比較多的一種是解放後黨一手培養起來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們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在入黨以後並沒有得到改造，一旦有了一技之長，有了一點本錢，就翹尾巴，反對黨的領導。^⑬

註 ⑧ 郭道暉，「從我的經歷看反右」，*炎黃春秋*（北京），2009 年第 5 期，頁 52~59。

註 ⑨ 陳守良，「回憶陸平同志對理科教學科研的領導」，*陸平紀念文集編委會主編，陸平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43。

註 ⑩ 陸平，「歲月鈞沉—回憶資料匯集」，*陸平紀念文集編委會主編，陸平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76。

註 ⑪ 胡壽文，「紀念陸平同志」，*陸平紀念文集編委會主編，陸平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62。

註 ⑫ 陸平，「歲月鈞沉—回憶資料匯集」，頁 277。

註 ⑬ 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開展反右傾整風運動向中央的報告」，頁 873。

彭真當家的市委撻伐「黨員專家」，在「黨外的資產階級專家」經過「反右派」鬥爭後已名譽掃地的情況下，竟敢出面為「資產階級」利益代言，「向黨爭奪領導權，主張『黨內專家治校』，重彈『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政治掛帥是說空話，靠政治造不出電子計算機來』的老調。他們自恃有資本，以特殊黨員自居，看不起黨組織，看不起政治工作，看不起群眾，反對群眾運動，給群眾運動潑冷水」。^⑧

截至 12 月初，根據北京市委的報告：北京主要高校的運動成績是北京大學技壓清華大學。北大參加運動的 128 個黨員教師骨幹中，「有不同程度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忽視政治的 40 人，占 31%，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以專家自居不服甚至反對黨的領導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的有 27 人，佔 21%，其中情節嚴重，經過批判仍然悔改很差的 5 人，佔 4%。」清大則在 174 個黨員教師骨幹裏，揭出 17 員，約佔其比例 9.7%。^⑨相較兩年前「反右派」運動中蔣南翔領導的清大獨占鰲頭，陸平的北大總算在此次「反右傾」運動中扳回一城。

彭真對於自身治下的首都高校運動結出揭討「黨員專家」的豐碩果實，甚為滿意。12 月 8 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呈送相關的運動經驗報告——〈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高等學校揭發出一批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的黨員專家向中央的報告〉。彭真在同月 16 日寫信給毛澤東，告之欲以中央名義批轉此一文件。^⑩彭真對首都高校「反右傾」運動經驗的自產自銷，顯然獲毛的認可。1960 年 1 月 6 日，中共中央將之批轉並強調：「浸透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黨員專家』，一面以黨員資格獲取黨內外的政治信任，另一方面又以專家資格同黨分庭抗禮，他們堅持要走反黨、反群眾路線的道路，他們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沒有入黨。」「他們雖然為數不多，但是因為具有黨員的稱號，所以比那些黨外的舊資產階級專家更能迷惑人，危害性也更大。」「對這些反對黨委領導的『黨內專家』，抓緊進行批判和教育，並以他們的例子教育知識分子黨員，這是目前黨組織一項極為重要的任務。這件事做得越早越徹底，就越能更多地挽救那些犯有這種錯誤的人。」^⑪

彭真的北京市自創的高校反「黨員專家」的運動經驗和對其「乖張劣行」的判別標準，經過彭真舉薦向全國推廣後，即成為他省學習、模仿的對象。例如：湖南省的文化教育系統「反右傾」鬥爭，就是宣稱要查找當地的「黨員專家」。^⑫

註 ⑧ 同前註。

註 ⑨ 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高等學校揭發出一批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的黨員專家向中央的報告」，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9 年）（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4 年），頁 903。

註 ⑩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頁 460。

註 ⑪ 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高等學校揭發出一批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的黨員專家向中央的報告」，頁 901~902。

註 ⑫ 戴安林，「1959 年湖南開展反右傾鬥爭始末」，文史博覽（理論）（長沙），2010 年第 12 期，頁 8~9。

捌、結 論

始之於 1959 年夏的廬山會議的「反右傾」運動，不但中斷了中共對「大躍進」採取的種種降溫措施，更為這個烏托邦式的政策起到另一波強力推進的作用，讓整個國家進一步地深陷經濟危機並嚴重加劇了大饑荒蔓延的程度和幅度。根據正文的討論，在這段時期代替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彭真，無論是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其後，皆竭力配合毛澤東推行「反右傾」運動：彭真先是在廬山上積極響應毛對彭德懷等人展開的政治鬥爭，捍衛了毛獨尊的政治地位和其在路線、政策上的發言權，使之爾後更能專斷妄為；彭真繼而在下山後，以中央領導人的名義出面將「反右傾」以政治運動的形式猛烈地推向各領域和部門。

在中央部門，彭真在得到其中央書記處同僚（特別是楊尚昆）的協助下，領導、監管中央黨政各部的「反右傾」執行狀況。彭真重視毛對之所做的「抓緊辦一下，使這個鬥爭深入下去」的批示，也銘記毛所說的中央衙門存有令之不舒服的「異味」。彭真以中央書記處會議為平台或用直接召集的方式，聽取中央黨政機關的運動彙報並給予評論和裁示。彭真先後提出「批判要提到原則高度」、「要把運動搞透」、「把司令部、參謀部搞好」等指示，莫不對中央黨政部門的「反右傾」運動起到施加政治高壓的作用。中央部門中超過 7% 的黨員成為重點批判和「幫助」對象，最後也清理出了好幾個「反黨集團」。運動如此「成效卓著」，讓毛頗感滿意。另外，彭真以代理主持中央書記處的身分，也與聞了軍隊的「反右傾」，並在軍委批鬥彭德懷、黃克誠大會上鼓吹對毛的個人崇拜。

在北京市，作為當地「父母官」的彭真，竭力將當地的「反右傾」運動炒熱，以跟他身為運動的中央指揮官的職分相襯。在彭真坐鎮下，京畿地區運動也「成績斐然」。彭真召集市委所有高幹開會進行運動動員以齊一思想、鼓動鬥志。為了證明自身領導的市委對「大躍進」始終一致、絕無貳心，彭真和劉仁竟將市委知情並支持的北大、人大人民公社調查組，硬生生地推入「反右傾」的烈焰火海中。領導兩校調查組的鄒魯風在悲憤交加下自我了斷。另外，在彭真的催促下，首都高校的黨幹創造、總結出揭發、批判校內「黨員專家」的運動經驗。彭真將首都高校的此項運動發明向中央推銷，進而讓之成為全國高校必須模仿的標竿。

在中央各部和北京市的「反右傾」運動中，獲得彭真之助而免被貶入政治另冊者，雖亦有之，⁹²但較諸因之直接或間接遭難的人數，實遠不可相比。彭真盡職地協助

註 92 例如：中央高級黨校校長兼黨委第一書記的楊獻珍、任職於中國人民大學的李培之（中共早期領導人王若飛的遺孀）。他們在運動中皆遭受批判，但最後在彭真的出手相助下而沒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蕭島泉，「楊獻珍和『大躍進』運動」，黨史文匯（太原），2003 年第 9 期，頁 16；王慧敏，「關山度若飛——採訪王若飛的兒子王興、兒媳張延忠」，郭戰平、趙曦主編，真情見證——開國領袖的親情家事（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年），頁 398。

毛澤東在中央黨、政、軍部門以及北京市強力掃蕩「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後來證實多為冤案)，同時也示警、「教育」了其他黨幹，不要再對「大躍進」指指點點，相反地，要集思廣益、甚至為之挺身而出。彭真管理、煽起的運動風暴，讓中央的「司令部」和「參謀部」氣氛緊張、噤若寒蟬。對新一輪的「大躍進」，中央朝中和官僚部門都不敢有異議，盡是一味迎合之聲，讓之任性發展直到一敗塗地為止。至於彭真對「反右傾」運動的其他重要戰場如地方省份和農村地區運動的參與情形，待未來更多資料面世後，可以作進一步的追蹤和探查。

綜上所述，彭真在「反右傾」中表現得甚為積極有勁。驅策其如此激進行事的原因為何？毫無疑問地，對毛澤東的崇信一以其政治斷言為判別標準、以之政治號令為行動準繩，是最主要的原因。毛澤東聲稱彭德懷在廬山上對「大躍進」提出的批評，不單是代表資產階級對相關政策的質疑和攻擊，更是意圖以此推翻以毛為首的中央領導的一次陰謀活動。彭真照單全收毛的整套說詞，並甘於擔任後者的政治打手，齊力編造了一個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回到北京後，彭真對毛「反右傾」的意旨不敢輕慢，在各級黨幹間大批、大整對「大躍進」有所不信和有所不敬者。

彭真在認真執掌「反右傾」大旗的過程中，也不能排除其懷有個人政治利害的計算和考量。在毛的主導下，鄧小平、彭真為正副領導人的中央書記處躍乎國務院之上，獲命督率黨政各部推進「大躍進」。在此政治安排下，彭真初嘗過問、領導經濟、政府工作之大權，實質成為「大躍進」的直接受益者。在廬山上，「大躍進」連同有關的人事權力安排，若如毛所言遭到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挑戰、甚至有被推翻之虞，彭真自難以坐視不管。下廬山後，彭真或也想把握難得的主持中央書記處的機會，冀望從領導「反右傾」運動中力爭表現，以獲得層峰進一步的青睞和欣賞。

正因為彭真對「反右傾」的堅定支持和堅決執行，在 1960 年中，他還公開大談其之正確和功效。^③但 1960 年「繼續躍進」所帶來的災難性結果，讓毛澤東也不得不反思「反右傾」是否有所不當。最後，毛做出的結論是：廬山會議上「反右傾」是正確無誤的，問題在於不應大張旗鼓地將之繼續向下擴散，致使誤傷多數。彭真也隨毛調整了對相關問題的看法和做法。

一方面，彭真在 1961-1962 年和鄧小平一起甄別處理了包括「反右傾」在內的政治運動所造成的冤案和錯案，其中有他個人和北京市委製造的北大、人大兩校聯合調查組一案（鄒魯風因為自殺，被開除黨籍，要遲至 1979 年才被翻案）。^④另一方面，對於引發「反右傾」的「禍首」彭德懷，彭真遵循毛的看法，繼續認定廬山會議和其後對彭德懷所做的政治指控如陰謀反黨和裏通外國，^⑤甚至還以誰與彭德懷有瓜葛做藉

註③ 1960 年 5 月 9 日，彭真在北京市委工業交通五級幹部會上強調「反右傾」的積極意義：「不反右，沒有今天這樣子。」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彭真、劉仁同志在市委工業交通五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提綱及修改稿〉，檔號 001-015-432，1960 年 5 月 9 日。

註④ 「北京大學原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鄒魯風同志追悼會在京舉行，王震方毅趙紫陽谷牧同志等送花圈，吳德同志等參加」，人民日報（北京），1979 年 5 月 11 日，第 4 版。

註⑤ 王焰編，彭德懷年譜，頁 787。

口，在黨內進行政治定罪和整肅（例如：1962 年批判、調查習仲勳的問題時，彭真就指稱習在高崗問題上曾包庇彭德懷）。^⑥讓彭真意想不到的，「文革」的前夕，他的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遭人指控利用文藝創作為彭德懷鳴冤、翻案。彭真自然清楚這個指控的嚴重性，努力為吳晗澄清。在此一過程中所引發的政治摩擦和衝突，反而成為他自己政治倒台的一項重要原因。^⑦

透過重建彭真個人在「反右傾」中的政治面貌，本文希望對中共政治史的相關研究能有所裨益，特別是為「大躍進」與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提供更完整的面向。首先是「大躍進」研究方面：「大躍進」發生至今已有半世紀之久，雖然中共官方史書（包括通史性質的讀物和人物傳記）不再對相關歷史及其所造成的巨大代價全然漠視，但多僅作選擇性的面對。「大躍進」的一些重要歷史環節和在運動中的個體角色及責任問題，都還有待進一步的探索和重建。本文聚焦彭真在「反右傾」中的表現和活動，除了直接彌補了彭真官方傳記對此記錄片面、零散的缺憾，更因為彭真是「反右傾」的重要當事人和關鍵執事者，其在職務上又跨足、連結了中央和首都，恢復他個人歷史面貌的同時，實也是對「反右傾」歷史的主要發展過程的一次重新爬梳和釐清。有助於觀察「反右傾」從領導高層擴展到中央部門，再向下發展到首都及其高校的運動歷程。

其次，在中共菁英政治研究方面：毛澤東對中共政治發展和菁英互動造成的重大影響已多有討論。然而，其他政治人物在毛的政治意志實踐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也應加以探究，因為毛在推行其主張和政策時，也須得到他人的襄助和奧援方能如願，本文所探討的 1959 年「反右傾」運動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毛在彭真的悉心輔助與縝密安排之下，將一場原本發生在高層的政治鬥爭轉變成馳騁全國的政治運動，更成功地藉之讓原本稍為減速的「大躍進」再次加足馬力往前奔進。從這一政治過程中，反映出彭真身為毛的政治助手，不僅是傳達毛的指示而已，還必須瞭解如何將毛的政治旨意和操作邏輯，與不同層次的具體情況作結合，以有效地推進「反右傾」的事態發展—滅「右派」的威風並陷之於孤立，長「左派」的志氣並助之成主流。彭真在自己獨當一面的領域和範圍內（如北京市），更能自主地對運動進行部署、監控和裁決，並對最後的政治結果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針對毛麾下的得力要員及其個別的歷史影響展開研究，將會讓中共高層政治和菁英人物的歷史圖像，更為豐富和細緻。

最後，本文也可以對彭真在「文革」後政治作為的歷史源由，有進一步的思考和認識。彭真較為人熟知的是其晚年對中共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耕耘和建樹。影響他投入相關領域建設的主要原因，在於他對毛澤東時期治國方式（尤其是群眾運動、政治動員）的全盤省思。然而，在毛時代接踵而至的政治運動中，彭真並非是一位事不關己的旁觀者或是一名簡單的受害人。事實上，直到彭真自己在「文革」期間飽受衝

註⑥ 李建彤，*反黨小說〈劉志丹〉案實錄*（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頁 10。

註⑦ Roderick MacFarquhar,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5, 17-19.

擊、久禁囹圄之前，他在毛所發起的諸多政治運動如「鎮反」、「肅反」、「反右派」，以及本文探討的「反右傾」，皆奔馳在前、狀若先鋒。因此，彭真後來汲取運動治國的經驗教訓、著重立法依法的重要性時，也應含有他作為早期運動活躍者自我回顧、戒慎的一面。

*

*

*

(收件：102 年 9 月 30 日，接受：103 年 2 月 12 日)

Peng Zhen's Role and Activities in the Anti-Right Opportunist Campaign of 1959

Yen-Lin Chung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summer of 1959, Mao Zedong launched the Anti-Right Opportunist Campaign in the Lushan Conference. Not only did it lead to a severe intra-Party power struggle, but also allowed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o enter its second round in 1960, further devastating the fragile economy. At that time, Peng Zhen was greatly involved in CCP decision-making and policy-implementation. However, Peng's crucial role in the Anti-Right Opportunist Campaign has received very little attention from Western publications. In addition, Peng's official biography written by the Chinese Party historians tried to downplay his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notorious campaig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following: during and after the Lushan Conference, Peng followed Mao closely and he proved himself particularly active in running the campaign. In Lushan, Peng zealously responded to Mao's criticism toward Peng Dehuai; shortly, back to Beijing, he was in charge of directing and supervising the Anti-Right Opportunist Campaign in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 military, the Beijing city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This study enhances the understanding of Peng's political career and the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Mao era.

Keywords: Peng Zhen, Anti-Right Opportunist Campaign, Lushan Conference, Mao Zedong,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參考文獻

- 「中國人民大學一百三十多位教師座談，揭露矛盾批評學校工作中的缺點」，人民日報（北京），1957 年 5 月 20 日，第 2 版。
- 「北京大學原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鄒魯風同志追悼會在京舉行，王震方毅趙紫陽谷牧同志等送花圈，吳德同志等參加」，人民日報（北京），1979 年 5 月 11 日，第 4 版。
- 「北京市經濟學會成立」，人民日報（北京），1959 年 7 月 20 日，第 6 版。
- 「全國高等學校加強政治教育工作，許多校院長和黨委書記主講政治課」，人民日報（北京），1957 年 12 月 19 日，第 7 版。
- 「斬斷劉、鄧、彭、陸伸進人大的黑手」，人大三紅（北京），1967 年 5 月 6 日，第 2 版。
- 「徹底清除教條主義、堅決反對修正主義，人民大學開始教學大改革」，人民日報（北京），1958 年 5 月 18 日，第 2 版。
- 中央國家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關於反右傾整風運動的初步檢查和積極進行甄別工作的意見（1962 年 4 月 10 日）」，宋永毅主編，中國反右運動數據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10 年），頁 2。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新編本）（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的 70 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
- 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開展反右傾整風運動向中央的報告」，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9 年）（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4 年），頁 868~880。
- 中共北京市委，「中共北京市委關於高等學校揭發出一批有嚴重資產階級思想的黨員專家向中央的報告」，北京市檔案館、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北京市重要文獻選編（1959 年）（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4 年），頁 901~908。
-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國共產黨北京市重要會議概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
- 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社會主義時期中共北京黨史紀事（第 4-5 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000 年）。
- 毛澤東，「對中央國家機關反右傾鬥爭情況等三個材料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8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594~595。
- 毛澤東，「關於中直機關開展反右傾鬥爭問題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8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557~559。
- 毛澤東，「關於隨時選送有重要材料性文件的批語」，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8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年），頁 587。

- 王焰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
- 王慧敏，「關山度若飛－採訪王若飛的兒子王興、兒媳張延忠」，郭戰平、趙曦主編，**真情見證－開國領袖的親情家事**（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年），頁 387~399。
- 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上冊）（香港：明報出版社，2008 年）。
- 李先念傳編寫組、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部，**李先念年譜**（第 3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年）。
- 李建彤，**反黨小說〈劉志丹〉案實錄**（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7 年）。
- 李新，**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
-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 3 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 李震中，「鄒魯風調查人民公社之禍」，**炎黃春秋**（北京），2009 年第 7 期，頁 12~16。
- 汪子嵩，「1959 年『反右傾』運動中的一件個案－憶人大、北大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縱橫**（北京），2005 年第 11 期，頁 11~17。
-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 胡壽文，「紀念陸平同志」，陸平紀念文集編委會主編，**陸平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62~64。
- 原北京市委機關毛澤東思想紅旗兵團，**大野心家、大陰謀家彭真罪惡史（1925-1966）**（北京：無出版者，1967 年）。
- 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 40 年**，增訂本（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年）。
- 郭道暉，「從我的經歷看反右」，**炎黃春秋**（北京），2009 年第 5 期，頁 52~59。
- 陳守良，「回憶陸平同志對理科教學科研的領導」，陸平紀念文集編委會主編，**陸平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41~44。
-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年）。
- 陸平，「歲月鈞沉－回憶資料匯集」，陸平紀念文集編委會主編，**陸平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12~284。
-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
- 彭真傳編寫組，**彭真傳**（第 1、3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年）。
- 彭真傳編寫組編，**彭真年譜**（第 3 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 年）。
-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主持東北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 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年）。
- 劉武生，「一樁不堪回首的往事－參加人大、北大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的回憶」，**縱橫**（北京），2006 年第 3 期，頁 56~62。
- 蕭島泉，「楊獻珍和『大躍進』運動」，**黨史文匯**（太原），2003 年第 9 期，頁 10~16。
- 戴安林，「1959 年湖南開展反右傾鬥爭始末」，**文史博覽（理論）**（長沙），2010 年第 12 期，頁 4~13。
-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年）。

蘇維民，「楊尚昆談廬山會議」，百年潮（北京），2008 年第 1 期，頁 10~17。

Chung, Yen-Lin, “The Witch-Hunting Vanguard: The Central Secretariat’s Roles and Activities in the Anti-Rightist Campaig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06 (June 2011), pp. 391~411.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MacFarquhar, Roderick,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otter, Pitman B.,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Teiwes, Frederick C.,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2nd edition*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Teiwes, Frederick C.,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檔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檔案館藏，〈9 月 25 日中央電話會議紀錄彭真同志的講話〉，檔號 219-1-27，1958 年 9 月 25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檔案館藏，〈彭真同志在 10 月 9 日中央電話會議上的講話〉，檔號 227-4-1，1958 年 10 月 9 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檔案館藏，〈彭真、劉仁同志在市委工業交通五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提綱及修改稿〉，檔號 001-015-432，1960 年 5 月 9 日。

